

#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 欧阳雪梅

**摘要:**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段重要思想发展历程,创造了新的理论、谱写了新的篇章。毛泽东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新的历史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基础条件。其思想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其挫折与失误为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提供了历史教训和借鉴。

**关键词:** 毛泽东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 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675(2017) 01 - 164 - 08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前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及步骤,提出了中国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方针。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探索中出现了失误,经济出现了两次大的起伏,但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使中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并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中华民族走上繁荣富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sup>[1]</sup>。本文重点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重要思想理论建树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

## 一、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实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从1953年开始,中国在前苏联帮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同时,自己的创造比较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是照搬前苏联的,一些消极后果开始显露。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斯大林与苏联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有所认识,提出“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 作者简介: 欧阳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09。

作《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会后才将内容通报中共代表团。三四月间,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以苏为戒”的思想更加明确。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sup>[2]</sup>3月23日,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揭了盖子”就是斯大林虽然有巨大功绩,但也有错误缺点,这“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sup>[3]</sup>4月4日,他强调: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教益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sup>[4]</sup>

9月,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向八大提交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sup>[5]</sup>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带领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研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次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sup>[6]</sup>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

##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确立了战略目标及步骤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

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提出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作出了分析。

一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此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sup>[7]</sup>。1956年11月,毛泽东与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时说:“现在天下基本上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过去,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sup>[8]</sup>他认为在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搞建设上来。他提出:“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sup>[9]</sup>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清醒的。但1957年6月开始,面对“党天下”、“轮流坐庄”这样一些否定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他对阶级斗争形势和性质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重大转折。9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只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sup>[10]</sup>。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他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sup>[11]</sup>这完全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

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阶级斗争特别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是有战略远见的,极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也很有必要,但关键是不能泛化,将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视为中心工作。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二是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作具体的阐述。斯大林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sup>[12]</sup>。毛泽东不认同斯大林的看法,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sup>[13]</sup>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汇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他解释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sup>[14]</sup>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而且分析出10组矛盾,“不仅及时回答了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为人们观察和思考新的历史进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活跃了思路,打开了全新的视角”<sup>[15]</sup>。

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入思考。11月4日,他提出:“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sup>[16]</sup>1957年1月27日,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初步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主张“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2月,他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名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并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

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sup>[17]</sup>所谓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sup>[18]</sup>。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但还不完善,需要不断调整。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完整表述。毛泽东认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采用民主方法解决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sup>[19]</sup>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sup>[20]</sup>

毛泽东改变了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揭示了矛盾的性质,为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体制提供理论依据。

三是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sup>[21]</sup>

关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最先强调的是工业化。因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

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sup>[22]</sup>他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就是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关键,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石,也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

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不光要实现工业化,还必然要求农业本身走向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他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sup>[23]</sup>在没有大规模机器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了旨在克服个体农业的分散特点,为适应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业合作化后,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作了探讨,把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纳入农业现代化范畴<sup>[24]</sup>。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提出建设现代科学文化思想。1956年1月20日,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搞建设,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会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11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时提出中国要“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sup>[25]</sup>思想。1957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sup>[26]</sup>3月20日,他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阐明了科学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sup>[27]</sup>1960年初,他强调,“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

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sup>[28]</sup>。

关于国防现代化,早在1951年12月,经毛泽东审改后下发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sup>[29]</sup>但此时“现代化的国防军”概念是就军队建设本身的任务而言的。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正式将国防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sup>[30]</sup>这就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反映了工业与农业、科学文化与经济建设、富国与强军目标之间的有机统一。1963年12月初发表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新闻公报,号召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sup>[31]</sup>。由此,“四个现代化”思想上升为国家战略,只是“科学文化”变成了“科学技术”。1964年底,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sup>[32]</sup>人们通常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正式公布的标志。

四是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论断。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0次会议上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sup>[33]</sup>1956年9月,八大确立党的中心工作后,他估计“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sup>[34]</sup>。1957年3月,他认识更精确些,指出:把国家建设好大概要一百年,并“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sup>[35]</sup>。毛泽东和党中

央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反右”斗争中“左”倾思想抬头,加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赶超浪潮影响,过于乐观,急于求成,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超英赶美”为“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sup>[36]</sup>。但“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首先总结教训,提出“不要急”,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是不行的”<sup>[37]</sup>。而且,赶超发达国家,关键问题还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仅仅是钢产量等几项经济指标。他多次提出“量力而行,留有余地”<sup>[38]</sup>,做好综合平衡工作。

正是经过冷静思考,195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中国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sup>[39]</sup>“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sup>[40]</sup>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sup>[41]</sup>毛泽东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在过渡阶段任务完成后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长远设想,即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到1980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宣布了这个“两步走”的战略步骤。虽然由于此时党的指导思想左转,阶级斗争成为中心工作,影响了现代化的扎实推进,但这一思想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三步走”战略步骤的直接思想来源。

### 三、制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了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指导方针。

一是制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sup>[42]</sup>如何处理党和非党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毛泽东一直关注的问题。1956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委汇报时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sup>[43]</sup>这就是说共产党要始终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sup>[44]</sup>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强调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他说:共产党要重视民主党派,还要帮助民主党派自己重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应该说有很大作用,直接做很多工作,并且监督共产党,监督国家工作。我们不但需要工人、农民广大群众监督,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来监督,避免苏联因为没有监督而犯了许多错误,长期不得纠正。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sup>[45]</sup>。“两个万岁”口号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的提出,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指针,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毛泽东推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合作。他在《论十大关

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复强调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中央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先后成立,毛泽东对西藏花费的精力最多,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书信往来,要求处理问题小心谨慎,充分尊重西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意愿。从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到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他都对悉心指导。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设想。如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党代表实行常任制等,并积极思考和探索如何领导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并有具体举措。譬如他提出把“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作为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办法加以肯定和推广,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要求在农村实行民主管理,干部必须定期向社员报告公共事务等等,以防范滋长官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鞍钢宪法”体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基本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本观念、全员参与等都有相通之处。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sup>[46]</sup>

二是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时,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sup>[47]</sup>,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时,工业产值仍然只占27.3%。为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劣势,毛泽东从我国

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方针,建立工业体系。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sup>[48]</sup>,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后来,他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主张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sup>[49]</sup>;阐明“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sup>[50]</sup>,提出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sup>[51]</sup>,进行改革探索。为活跃经济,他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sup>[52]</sup>。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鉴于前苏联的教训,毛泽东要求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和集体必须保持适当的积累,但都不能过多。要尽可能使人民群众能够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改善生活<sup>[53]</sup>。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经济,他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sup>[54]</sup>。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是要走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道路。他明确表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sup>[55]</sup>“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sup>[56]</sup>

三是制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他旗帜鲜明地说:“在我们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sup>[57]</sup>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作了“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的批示。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一经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1957年3月,他针对党内少数人的质疑强调,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它同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其他重要方针一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保证。

为处理与既有文化的关系,毛泽东确立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提出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他强调要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因此,“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sup>[58]</sup>。而且,“现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阵地,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肯定历史文化中一些积极的东西”<sup>[59]</sup>。毛泽东指出:“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sup>[60]</sup>毛泽东认为,“洋为中用”这个“洋”包括外国的一切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sup>[61]</sup>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sup>[62]</sup>所以,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毛泽东提出了要造就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和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为此,提出在教育领域开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好各级各类全日制普通教育体系,为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是建设成人业余教育系统,通过扫盲、业余学习提高在职劳动者文化科学水平,培养大批工作骨干。

毛泽东领导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整合社会、动员民众、引领风尚、提高国民素养,齐心协力推进国家工业化、提升文化自信、应对外部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关于执政条件下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外交方针政策等亦有系统的思想创建。总而言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凝聚着集体智慧,“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sup>[63]</sup>,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20年的探索也有曲折和失误。第一次是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和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1958年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遭遇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第一个严重挫折。为了纠正失误,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sup>[64]</sup>,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sup>[65]</sup>第二次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虽然主观上是为加强党的建设,消除官僚主义思想特权,有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战略思考,但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错误估计了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导致出现了“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犯了严重错误,但他没有把权力交给林彪、江青,对认识到的错误进行了调整,在领导外交和经济等工作方面作了不小的贡献<sup>[66]</sup>。探索的曲折,反映了认识规律的不易、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艰巨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东西方冷战的高潮期,毛泽东晚年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sup>[67]</sup>。这些失误为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提供了历史的教训和借鉴。

注释:

[1] [6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 [3] [4] [13] [43] [5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第550页,第557页,第549页,第563页,第568-569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6] [19] [20] [28] [30] [41] [49] [55] [58] [6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第133页,第131页,第126页,第116页,第302页,第123-125页,第71页,第225页,第225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8] [9] [10] [16] [25] [27] [35] [37] [6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第120页,第207页,第23页,第24页,第119页,第119-120页,第505页,第568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页。

[12]《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2页。

[14] [17] [18] [24] [26] [34] [44] [48] [50] [51] [52] [53] [62]《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第204、214页,第213-214页,第241页,第268页,第124页,第34页,第24页,第435页,第53页,第170页,第221页,第82-83页。

[15]陈晋《奠基和探索: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后的考察疏理》,《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1期。

[21]《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22] [5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第331-332页。

[23] [4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页,第1430页。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8页。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32]《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33] [4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第387页。

[36] [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0页,第641页。

[38] [39] [4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84页,第264页,第270页。

[4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00页。

[4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页。

[5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6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6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6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66]《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责任编辑:禹兰